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

齐梁萧氏文化概论

刘志伟 史国良 李永祥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齐梁萧氏文化概论 / 刘志伟, 史国良, 李永祥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8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7721-7

I. ①齐… II. ①刘… ②史… ③李… III. ①姓氏—
文化—中国 IV. ①K8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8703 号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

齐梁萧氏文化概论

刘志伟 史国良 李永祥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苏州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7.25 插页 4 字数 380,000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7721-7

G·619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根極榮深
枝葉暖茂

劉彥和語

昆陵袁行需題



总 序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江南文明历史悠久，亦为其重要源头之一。考古成果不断表明，早在十几万年以前，江南就是古人类的生存之地，这里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密集，遗物丰富多样；早在七千年以前，江南就有耜耕农业和采用榫卯技术之干栏式建筑，生产水平处在同时代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先地位；早在五千年以前，当华夏先民纷纷渡过横亘在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界河之际，江南已经是屹立在界河彼岸的东方明珠。

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经营，华夏文化逐渐在黄河中下游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当华夏文明盛行的时候，江南文明依旧保持强劲的活动力，令中原不能不予以尊重。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篇末写道：“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这里说到的勾吴，就是春秋之际立足江南的古吴国。能够被文明发达的华夏视为平等的兄弟，原因就在于勾吴也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司马迁在上引世家中还热情赞扬一位江南贤达，为“闾览博物君子也！”这位贤达名曰季札，是勾吴的开国者太伯之后裔。季札曾游历华夏诸国，与显赫一时的齐国晏婴、郑国子产、晋国叔向等政治家平等对话，他

的言论受到高度重视，他对各国政治的分析后来竟然都成现实。

司马迁对季札“阅览博物”的评价绝非虚夸。鲁襄公二十九年（前 544），季札受聘于鲁国，获得观赏周乐的高规格礼遇。季札一一欣赏周乐的篇章，他盛赞华夏礼乐，不禁由衷叹为“观止”。从此观止一词流传千古。在当时，鲁国并非强国，却是文化大国，而周乐则是鲁国保存的至高礼乐。因此，鲁国能请季札观赏周乐，表明季札的文化素养早已蜚声华夏。季札能够贴切地品评周乐诸章，说明他的确见识高雅广博。值得注意的是，季札在叹为观止的同时，还谦逊地表示“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对此，服虔指出：“周用六代之乐，尧曰《咸池》，黄帝曰《云门》。鲁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乐吾不敢请。”由此可见，季札的话语表明了他对周乐敬仰的态度，表现出虚心学习中原传统文化的精神。季札的后人正是发扬了这种谦逊的精神，方能不断进取，从而融合华夏文明，促使得江南文明历久弥新，因而长盛不衰。

季札在《史记》中被称为延陵季子，因为他的封邑在延陵，故以地名为号。延陵的环境培育出一位阅览博物的君子，反映当地文化底蕴丰厚；也因为季札高雅广博而虚心进取，延陵才长久地广为人心向往，才被誉为古吴文化的中心和江南文明的发祥地。此后，延陵又有毗陵、毗坛、晋陵、南兰陵等名称，延续至今即常州市也。这里地处中吴，左携长江，右揽太湖，物宝天华，人杰地灵，乃是江南文化引以为豪的响亮名片。

二

南兰陵之得名，皆因西晋末年兰陵人萧整率族迁居晋陵的缘故。《南齐书·高帝纪上》记载：“侍中（萧）彪免官居东海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今山东省兰陵县）。晋元康元年（291），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萧）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今江苏省常州市西北孟河镇万绥社区和南兰陵社区）。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由此可知，南兰陵侨置于晋陵，也即季札受封之延陵。

萧整率族南迁是当时北方汉族人民大规模南迁潮流中的一小支。西晋末年,中原战乱频仍,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入华”,中小战争更是接连不断。动荡不安的政局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势如汹涌的波涛刷洗了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昔日的良田美畴被无情的铁蹄践踏,汉族王朝的版图被林立的少数民族邦国瓜分。长期的战乱使中原人口锐减,幸存的土族与民众纷纷流徙他乡。在徙民之中,以逃亡江南者居多。江南民众素有包容之心,江南土族亦具和谐之意。虽然北来土族与江南土著之间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上常有摩擦,但是总的趋势是共处相安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东晋和宋、齐、梁、陈等王朝相继建立起来。

随着大批土族与民众的南下,包括三代、秦汉、魏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内的华夏文明被带到江南。而江南则显示了季札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充分地接纳和充足地吸收着华夏文明的精华。于是,秦汉时期一度沉寂的勾吴文化被激活了,经过与华夏文明的融合,而升华成为新型的江南文明。换言之,新型江南文明之形成,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江南固有的悠久文明,外因是中原徙民带来的华夏文明。新型江南文明既然形成于南朝时代,在此不妨称为南朝文明。无疑,南朝文明的中心仍旧在季札旧封邑、中吴南兰陵。

萧整族人被接纳到南兰陵定居,真是得天独厚。南兰陵的肥田沃土养育了中原徙民,南兰陵的广博文化滋润了萧整族人。萧整族人在这块风水宝地繁衍生息,被浓郁的南朝文明熏陶出优秀的后代,从南兰陵竟走出了几十位文化巨匠和两位开国君主。这两位开国君主是齐高帝萧道成与梁武帝萧衍。萧道成与萧衍能够开辟帝业,均经历过一番波折。然而,看似偶然的历史结果,其实决定于必然的文化背景。两位萧氏子孙建立帝业的背景,就是萧整族人在南兰陵扎稳的根基。萧道成与萧衍,以南兰陵为根基,开创了辉煌灿烂的齐梁文化,这可以看成中原徙民适应江南新环境的样板,也能够视为江南以博大胸怀包容徙民与其文化的典范,更应该说是华夏文明与江南文明熔炼而成的结晶。

正是这样,中原人民与江南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建设成一派大好河山。自晋室南渡以后,宋、齐、梁、陈列朝相继,江南面貌发生日新月异变化。而其鼎盛时期就在齐、梁二朝,正如《南齐书·良政传序》记载的那样:“(南齐)永明之世(483—493),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袿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齐朝统治时期,经济发展,人民安居,社会和谐富裕。而经济的发展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进步,犹如《梁书·武帝纪下》记载的那样:“于是御凤历,握龙图,辟四门弘招贤之路,纳十乱引谅直之规。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加以天祥地瑞,无绝岁时。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瑰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史官所言虽属歌功颂德,但也饱含事实,即使与魏、晋相比,齐、梁也毫不逊色。真可谓,文化之兴尤在萧氏齐梁,都邑之盛突显江南兰陵。

三

中华文明长流不息,而齐梁文化始终熠熠发光,震古烁今。如今,季札遗风尚存,齐梁风流再现。常州市党政领导十分重视齐梁文化的传承弘扬,专门成立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已历多年,成果斐然不断,遂令学界瞩目。在众多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专家学者大力支持下,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成功主办“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会后,将与会七十多位专家提交的论文编辑成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又编著《常州齐梁文化遗存》,真是令人喜出望外。

现在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与课题组再接再厉,又交付上海古籍出版社《齐梁文化研究丛书》。这不仅是常州市全面深入研究齐梁文化的丰硕成果,也是海内外探索南朝文明的崭新成就。感谢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对我的信赖,首先将其中各书的提纲与内容梗概寄示,随后又将书稿交我审读。作为吴地后裔,

我既觉得荣幸,又深感不安,唯恐辜负江南父老的殷勤嘱托。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共计八册。

其一为庄辉明教授著《南朝齐梁史》。是著立论新颖,发前人所未发,将齐、梁两朝近八十年历史合并撰述,以论证二者共同奠定江南在中国历史上突出地位的过程,以阐明二者相辅相成方能高踞南朝文明之巅的因果,以肯定二者之文化成就为隋唐制度之重要源泉。是著可兼为本丛书之总纲。

其二为龚斌教授著《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史稿》。是著将南兰陵萧氏视为一支息息相关之文化大族,专论其在经学、玄学、文学、史学、美学、宗教、艺术等文化方面的贡献,进而评论该家族文化之兴起、发展、隆盛、衰败的过程与意义。填补了研究南兰陵萧氏家族文化上的空白。

其三为陈蒲清、曹旭、王晓卫、丁福林、李华年、杨旭辉等专家合著《南兰陵萧氏人物评传》。是著分别对齐梁文坛众萧氏人物之事迹与文学成就给予评述,单独成篇,合而成著,蔚为壮观地展示一个文化大族的历史贡献。

其四为刘志伟教授等著《齐梁萧氏文化概论》。是著围绕齐梁萧氏中的关键人物之文化活动与文学研究作系统的分析评价,以展示这支文化大姓的发展历程与辉煌成就,从而填补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

其五为曹旭教授等选注《齐梁萧氏诗文选注》。是著精选三十余位齐梁文人三百余篇作品加以注释和笺说。所选诗文均系源自原始文献之佳作,所写注释均为独立研究成果,所作笺说不仅纪实而且探索心灵感应,以此让读者感受此期诗文之美学价值。

其六为张敏编审编著《南兰陵萧氏著作综录》。是著以人物系书目,全面梳理南兰陵萧氏的著作。其功力在于详列各著作在文献中的著录及存佚状态,并通过校订而对作者、卷数、内容等项在诸文献中的记载差异进行辨析,此外还对版本以及后人的整理工作加以介绍,为翔实完备的工具书。

其七为常州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薛锋、储佩成方家主编《齐梁故

里与文化论集》。是著在 2009 年《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之基础上精选而成,经修订而编为两辑。第一辑编入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的长篇调查报告《南兰陵桑梓本乡,武进王业所基——齐梁故里考》等论文,均为关于南兰陵萧氏故里的考据文章;第二辑编入二十余位专家研究齐梁文化的文章,是当代学者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的重点展示。

其八为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薛锋、储佩成主编《常州齐梁文化遗存》(修订本)。是著依常州及武进地区现存的文化遗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说故事与轶事掌故划分为三大部分。其后,载有两项附录:一是建康和京畿具有代表性的物质遗存照片及台湾省的几帧齐梁文化遗存照片;二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出版的一百四十多部相关著作之内容一览表。全书汇集大量珍贵文物图片和文献资料,颇具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为研究齐梁文化和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书。是著系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多年通力合作的辛勤积累,为常州人民所作的重大贡献。

上述八部著作构成了一套完善的丛书,其间贯穿着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高瞻远瞩的宗旨,那就是立足南兰陵,着手齐梁文化,置身江南传统,放眼中华文明。在这样的宗旨指导之下,就能高屋建瓴地把握丛书的全局,曲径通幽地展示各书的章节。既做到了选题角度新颖,又能涉及广泛内容;进而开创新的领域,填补学科空白;而且考据鞭辟入里,论证深刻精到,文字畅达而富有说服力。

这套《丛书》所以编著得出色,因为具有三方面的良好因素:其一,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与课题组,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怀抱亲乡爱家的热情,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终年累月地奔走呼吁,长期不懈地辛劳努力,终于成就正果。其二,作者都是学界名流,或者扬名中外,或者著作等身;既有年高德劭的资深大家,也有近年崛起的新锐:这就必然能编撰出这套学术水准高而又可读性强的精品丛书。其三,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享誉中外的专业出版机构,不但为文稿的完善尽心尽力,而且为丛书的装帧设计锦上添花。

总 序

我高兴地看到，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与课题组发扬季札的谦逊进取精神，将常州境外的学者与本地学者密切结合，以协作研究地方文化和从事著述的方式，不仅能使科研成果质量确有保障，而且可以推动本地文化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进而将地方历史文化的影响弘扬至全国乃至世界。常州齐梁文化研究课题组的经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齐梁文化研究丛书》即将出版，可喜可贺！常州市《齐梁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嘱我写序，因为是故乡邻县之大事，虽然诚惶诚恐，却不敢推辞。我深信，延陵后裔阅览博物，必能发皇古义，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因此向读者呈献以上文字。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 李凭谨识
甲午处暑于横琴

前 言



在具有广泛的宗教文化背景的地域及民族当中,人的行为心理首先具有鲜明、深刻的宗教特征。对于生命及种族来自何处的追溯,很自然地推究到宗教创世神话。而中华民族以实用理性思维为主导,也受地域、经济活动模式及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形成视宗教信仰为其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的文化心理与传统,对象化的神也最终没有成为人们精神的主宰,祖先崇拜从根本上削弱、并实质取代了自然神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位置。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宗族实际就成为个人生命价值的源泉和依托。

在我们所知的华夏历史中,最早将众多个体的人凝聚成为一个具有社会性群体的纽带是血缘。更大的社会组织内部,则始终存在以血缘团结为一体的群体,其外显标志就是姓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以一族一姓为标志的宗族,既是延续文化与传承文明的社会组织载体,同时也是个体精神与肉体从属之源。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政权更替如同潮头的浪花,生灭轮转,而香火绵延的宗族却如同浪花下的潜流,奔涌向前,不曾停息。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发展,就是在无数一族一姓相映成辉的荣光中,奔腾向前的。

二

华夏文明以礼乐文明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的影响重大而深远,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礼乐文明是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以血缘纽带为核心而延伸出等级关系以及伦理规范。夏商周以来,这样一套体系化的以伦理道德为主的礼乐教化制度,逐步成形、成熟。《尚书大传》记载: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①

西周建国之后,周公制礼作乐,第一次从制度、组织、行为以及观念层面,奠定了中华民族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基础。推究周代礼乐文明的实质,大致是在以姬姓为主的华夏族群内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认同并且尊崇共同的祖先以维系亲情、团结族群。同时在宗族内部区分长幼尊卑,采取与商代中前期“兄终弟及”不同的“嫡长子继承制”,规定不同地位的宗族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这样的一种宗法体制,成为稳定而合理的社会伦理乃至政治组织形式。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血缘宗法的维系力度微乎其微,无力在政治层面支撑周朝继续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恢复周礼,实行仁政。但他们理想化的“王道”、“仁政”主张,在恶劣的现实中实在迂阔难行。即便如此,宗法礼制依然相沿成习。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提高到统治阶层指导思想的高度,加强了对礼乐文化的认同,稳固了此套政治宗法体系。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进化,在中华大地上,以宗族内血缘为基础而构建的伦理纲常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绵延两千多年,成为中国

^① 《尚书大传》的作者今已难以详知。《史记》、《汉书》但称伏生,今人或认为系伏胜的弟子张生、欧阳生所作。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8—30页。

人的民族心理与基本人格的内核。

由于对宗法礼制的重视，在政治与伦理矛盾冲突时，亲亲之谊有时甚至大于国家法制。著名的例子，如“告父攘羊”事件的经历历史时空的“被围观”。《论语·子路》记载：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在《论语》的记载中，面对国家法制与亲亲之谊间的抉择，孔子直白讲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韩非子·五蠹》则演绎了《论语》的记载：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

在本条记载中，儿子告父攘羊，因“直于君而曲于父”，而被令尹处以杀戮极刑。《吕氏春秋·仲冬纪·当务》更多拓展之处：

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儿子在先告发父亲后，又自我要求代父受刑，并以自己告发行为成全了国家法制之“信”，代父受刑尽了“孝”道，要求得到赦免，楚王也因此赦免了他。但孔子仍认为假借“孝”、“信”名目规避法律惩罚，并非真正的诚信行为，如此之“信”，不如无“信”。因为它必然助长巧言伪诈之风。此外，汉代如韩婴《韩诗外传》、桓宽《盐铁论》、班固《汉书》与《白虎通》、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等，也对此一事件多有

关注评论。^①

《孟子·尽心上》的记载也很典型：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沂然，乐而忘天下。”^②

这段记载也容易被拿来当做法治与人治话题的焦点。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在面对国家利益（法制）与家族利益（孝道）的矛盾冲突时，由于既需免除自己失职之责，又需保全尽孝之意，舜首先考虑的仍然是孝道，因此不惜选择抛弃天子职位，以求破解其两难困境。而如此处理的象征意义在于：舜在牺牲具体的国家利益以保全孝道的同时，实际上保全的却是国家得以确立和稳固的道德伦理基础。反过来说，如果舜为国家利益而大义灭亲，以天子的职责命令皋陶收捕父亲，放弃对孝道的坚持，这样的做法，表面上看似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也确实维护了国家利益，但究其实质，却瓦解了国家观念得以确立的道德伦理基础。当然，保全孝道而放弃政治权力的前提是“家国同构”社会政治结构，无数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形成的家族，构成了具有更大结构特征的国家。正因如此，孟子还刻意渲染了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欲“逃离”政治、“通海滨而处”、“忘天下”而获得“终身沂然”之“乐”的行为。孟子所谓奉亲尽孝之“乐”，胜于贵为天下之主，自然表达了对生命个体能够超越现实功利，在家庭孝睦和乐中安身

^① 关于“告父攘羊”事件的相关记载，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21—322页疏证周详，可详参。也可参看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9页的相关论述。

^② 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月版，第317页。

立命的憧憬与期待。^①

《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邴原别传》所记邴原言论,则体现了门阀士族阶层普遍的被固化的家族利益至上的文化心理:

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

太子曹丕关于以药丸救人,于君、父孰先孰后的提问,自然是站在曹魏王权立场上,邴原对曹丕的追问,居然“悖然”而斩钉截铁地以“父也”回答。正体现了门阀士族视家族利益高于王权、并予以坚决维护的精神意志。^②《世说新语·轻诋》记载的许询言论,亦与邴原同调:

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③

许询当着东晋简文帝的面宣称“举君亲以为难”,自然是不给帝王面子。简文帝也只有在许询走后怨叹许询不应如此无礼。但它确实相当真实地凸显了东晋王权仰门阀士族鼻息进行统治的政治现实,其对王权统治与国家意志的消解作用也是毫无疑问的。故身处抗战时代,忧愤著书的余嘉锡,在论析王绥预为“存亡未测”的父亲守丧,被时人称为“试守孝子”事件时,就以沉痛笔触指出汉末魏晋迄于南朝门阀士族家族利益至上、罔顾国家大义之弊,也指出唐宋以“正学”导

^① 详参《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69页的相关注疏内容。

^② 参见卢弼《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8页的相关记载。

^③ 参看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39页的相关笺疏。

引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之因：

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言。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爰及唐、宋，正学复明，忠义之士，史不绝书，故得常治久安，而吾中国亦遂能灭而复兴，亡而复存。览历代之兴亡，察其风俗变迁，可以深长思矣。^①

为了国家的兴旺强盛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余嘉锡的话，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三

古代埃及法老们为自己精心筑造庞大的金字塔，预备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享受生前的奢侈与荣光。从古老的殡葬习俗考察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念，多少能够看出先民对身后世界的模糊的构想。而春秋战国之际，孔子理性地提问：“未知生，焉知死？”庄子主张“一死生，齐万物”，都对死亡问题予以理性回避。孔子甚且痛心疾首地控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②说明至少知识分子阶层没有精心构筑彼岸世界的打算，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于是否真正存在所谓死后的彼岸世界，死后有无可能继续延续享受生前的功业、财富、荣誉等，有无必要“作俑”，其实是不太确定且抱持怀疑态度的。

与对死后的所谓彼岸世界的关注、探究热情不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在先秦时代，华夏民族的士人对于活在世上要积极进取、追求获得不朽的精神价值，就已具有自觉意识。在形成以血缘伦常为

^① 本条事迹原文见《世说新语·德行》：“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详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5—47页的相关笺疏。

^② 参见《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67页。

纽带的家天下体制与宗法社会体制的先秦时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①也成为士大夫阶层所崇奉的政治人生理念:不仅对生命获得不朽的精神价值,抱持强烈的意欲追求,也将以实现个体生命的自我价值、光宗耀祖、使得整个家族绵延且万世流芳,作为个体生命的根本性追求方向。鲁大夫叔孙豹对“三不朽”的著名论断,就是以家族成员的个体生命的不朽价值与整个家族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关系为基本出发点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当晋国范宣子夸耀其家族范氏历代“禄之大者”时,叔孙豹就给他上了怎样才算真正光宗耀祖之课,也给后世定下了实现自我政治人生价值、追求家族荣耀的“三不朽”标准模式: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②

叔孙豹指出:仅是“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并不值得炫耀。因为这种方式停留在维系家族生存私利的低级层次,鲜少真正的精神价值内涵。只有超越生存层次,追求立德、立功与立言,成为民族和国家的骄傲和自豪,才可使自我及家族获得永恒性的精神价值,使家族文化获得真正不朽的灵

^① 语出《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见《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3页。

^②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88页。